

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

曹增友著

——中西文化的调适与碰撞



随着东西海上通路的发现，15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开始了由东西方的双向传播。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深刻的碰撞。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明初的传入，到清代的禁教，再到近代的传教士大规模来华，其过程充满了曲折与冲突。本书旨在探讨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的关系，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调适与碰撞。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复杂背景、面临的挑战以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了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读物。

印家出版社

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

——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

曹增友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曹增友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9

(阳光文丛/黄敏,唐活水主编)

ISBN 7 - 5063 - 3775 - 4

I.基… II.曹… III.基督教史-中国-明清时代

IV.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1206号

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

作者: 曹增友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艺林风文化

版式设计: 功艺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36千字

印张: 10

印数: 001-3 000

版次: 200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5063 - 3775 - 4

定价: 2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本书稿是明清际基督教在华传播和这时期来华耶稣会士传教方法的专论。它展示了这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所经历的开创、发展、兴盛后又衰落的起伏过程及相应的每个时段传教士传教策略运筹,旁及了中国社会对此的反应、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及各修会间于在华传教方法上的对立和差异。

书稿写作体现两个特点:

一是突出传教策略的实质问题——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以之为认识轴线贯穿于各部分内容的构思中,通过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耶稣会传教策略、西教传播这三者间的关联效应和因果关系展示中学和西学间在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又展示出在宗教利益和明、清两朝帝国利益的复合构建中不同制式的中西文化所达成的某些融合;二是以方法策略的合时性、科学性、远瞻性为视角,对方法作价值评

判,形成传教学的方法认知体系。

本书稿出版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资助。张曾红处长经办,宋书伟、阎崇年、吕智敏、曹随四位研究员负责学术审定,谨表谢意。

曹增友

2006年7月28日

目 录

第一编 创业者的谋划

第一章 耶稣会士的东来

——西方殖民势力的一部分…………… 3

第一节 西方的殖民掠夺和天主教对外扩张…………… 3

第二节 耶稣会性质和使命…………… 6

第三节 耶稣会东来及对中国政治和宗教性征战 …… 10

第二章 打破海禁,图谋武力征服…………… 12

第一节 因海禁政策殉难的传教士 …… 13

第二节 武力传教的策划与尝试 …… 17

第三节 郭居静“覬觐”帝位 …… 29

第三章 以和平方式推进…………… 32

第一节 耶稣会适应策略的确立…………… 32

第二节 开创适应传教策略的先驱	37
第四章 早期耶稣会士的适应方式	46
第一节 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古代经典	46
第二节 遵从中国礼仪习俗	51
第三节 行善事,廉洁自律	58
第四节 以自鸣钟及科技奇物打开中国门户	61
第五章 哑式传教	68
第一节 无风险具实效的传教方法	69
第二节 罗明坚的教理著述	72
第三节 利玛窦的教理著述	76

第二编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与实践

第六章 走上层路线,消弭对抗,扩张影响	83
第一节 降低神学预设	83
第二节 走上层路线,结交士大夫	85
第三节 躲过广州耆老的诉讼,消弭对抗	89
第四节 移居韶州,在中国人文主义的光照下	92
第五节 赴京进贡,寻求皇帝支持	98
第七章 学术传教	110
第一节 以才能德识赢得声望	111
第二节 研究中国学问	119



第三节 以西方科学作立足传教手段	125
第八章 以儒学作盟友	135
第一节 求助经典,附会基督教义	135
第二节 批判理学 消弭传教障碍	147
第三节 击战异端——批教	154

第三编 宫廷服务与明清王朝的容禁教政策

第九章 教案脱劫,基督教再兴	165
第一节 策略失当引发反教风潮	165
第二节 在教善教官绅护教	167
第三节 因修历、造铕争得明廷容教	171
第十章 借服事南明,皈依中华的尝试	177
第一节 南明流亡政权急切用得着的人才	177
第二节 南明王朝基督化	178
第三节 卜弥格出使欧洲和罗马教廷	182
第十一章 以人才、技术应对新旧世变	188
第一节 汤若望权变及其保教角色	189
第二节 人才文化服事与基督教再呈繁兴	194
第三节 因被忌恨引发的麻烦和教案	202
第十二章 康熙朝基督教的起落及传教士所为	213
第一节 南怀仁救教	213

第二节	影响康熙帝的宗教政策	222
第三节	令会士欢娱至极的胜利	238
第十三章	康、雍、乾三朝禁教及教士的策略应对	249
第一节	“礼仪之争”与康熙朝禁教	250
第二节	皇储的“政治旋涡”与雍正帝禁教	267
第三节	乾隆帝禁教	280

第一编 创业者的谋划

因着东西海上通路的发现,16世纪初,西方殖民国家和罗马教会联合,开始了向东西方的双向性扩张。中国之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及其在周边国家的盟主地位,使西方教会垂涎动心,成为他们急欲征服的重点目标,天主教由是在中国重新获得传教机会。来华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为最多,影响也最大。

基督教虽在唐、元时两次传入中国,但对传教士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已无任何可承续、依托的力量可寻,一切要从零开始。明政府这时实行海禁政策,传教士只可垫居在澳门,因而在内陆建立居点,实现基督教由澳门向大陆的发展成为来华创业者的首要目标。为此,他们作过多方面努力和方法试尝:武力进击、秘密潜入活动、携礼物晋见广东地方官等,均遭失败。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领悟到中国不同于其它地区,要使基督教在中国立足,需靠一种文化上的功夫,这即采取适应策略,以和平方式缓慢推进。

耶稣会士的适应策略以取悦于人、博得民众的喜欢和长官的恩施为原则,其实质可说是对其母体文化和个人行为的有节制性减幅调制和对望教方文化、官方意念的有目的性褒扬及遵从,是弱势群体为图谋自身发展需借助强势力量而向其所示的谦卑姿态,是在不同域文化对立中寻求合作性的一种自律性谋划。其方法表

现是：在形表和生活习俗上中国化；在行为上严格伦理规范；与给中国人造成恶感的“佛郎机”人保持距离；处事小心谨慎，对来自平民的攻击和挑衅，宽容忍让，任吃亏也息事宁人；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以展示西方科技文明树立声望，以西方科技奇物为贿品寻求官方保护；于传教不急于求成，隐讳其来华动机，采用无风险具实效的传教方法。正是凭借这些积极而又稳妥的办法，早期耶稣会士叩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在肇庆建立起会所，奠定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基础。

第一章 耶稣会士的东来

——西方殖民战略的一部分

中西双方曾循着不同的生活制式和思维观念彼此隔绝了几千年,然到近代,双方却因着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全球一体化,打破隔障,实现了会通和交往。初时的中西接触是依托西方的殖民运动和宗教改革进行的,耶稣会士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以殖民扩张和传教的联袂带动起来的中西交往,使基督教在华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带上了特异的历史色彩。

第一节 西方的殖民掠夺和天主教对外扩张

至十六世纪,西方因受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和海上通路发现的推动,要求开辟国外贸易市场,中国就成了急欲征服的目标。因为西方人早已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了解了中国的富庶,认为“中国和印度”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如在十六世纪初到过澳门的西班牙奥斯定会士门多萨(J·G·de Mendoza)就曾以啧啧称羨的口气谈到中国的富庶,说:“……没有比这更富饶的地方了,这儿有人类生

活所需的一切东西,简直没有匹敌,他们因着它的富饶,不得不在这儿定居。他们找遍世界再也找不到类似这里的了。”^①又说:“它有丰富的金矿、银矿、储备及别的金属,……金子比欧洲便宜,……在全国有大量的珍珠。”^②

当时欧洲,因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旧的金银产量逐渐减少,大量资金流出欧洲,因而各国都渴望得到黄金。正因为这样,殖民主义分子疯狂地从各占领地掠夺黄金。如从1521—1544年,西班牙每年要从美洲抢走黄金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③。中国既然遍地都是黄金,自会使殖民分子垂涎,迫不及待地想来掠夺。一位1554年前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外号“热心海贼”的平托(Mendez Pinto)就曾扬言他在回国时,要从中国携带9000或10000金币(Cruza-dos)。^④

除黄金外,令欧洲人醉心的还有到中国进行贸易,因为这可获得巨大利润。如将从菲律宾、马来西亚诸地购得香料来中国贩卖,所赚竟是原价的60倍,因是有人说:“胡椒在东方很被人看重,葡萄牙人正是因此来到印度,他们到中国作上两次买卖,就能发财致富,所以向中国来的商客很多。”^⑤

葡萄牙(明史称佛郎机)人正是带着发财的强烈愿望来到东方,是西方国家中最先插足中国者。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就着手计议向中国进军。愈三年(明正德九年)葡萄牙军官若望·阿尔发罗斯(Jorge Alvares)率舰队来到广东东莞县属的屯门岛,并在此立石作文,以示占有。以后葡萄牙殖民分子一方面循外交路线遣使进贡,谋求与中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又以武力偷占我

① 门多萨著,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8—9页。

② 同上,第14页。

③ 波梁斯基著:《外国经济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448页。

④ Henri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16^e siècle 1514—1588, p. 28.

⑤ Henri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16^e siècle 1514—1588, p. 39. 又见裴化行著,萧濤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第65页。

国沿海岛屿,还与倭寇、海盗相勾结,骚扰掠夺,杀人越货,拐食小儿,贩卖奴隶。

葡萄牙殖民军原本是想占领中国,但在与中国海防军每次交火后都被中国人打败,自感无力吞下中国这只大象,不得不收敛野心,1553年“租借”澳门后,虽不时有对中国的不法之举,但已不敢到处扩张,不敢发动对中国侵犯的大军事动作。

西班牙人在1595年入侵菲律宾后,亦把征服中国作为战略目标,只是因受到葡萄牙在东方殖民势力的抵制,其对华殖民野心才未得逞。葡萄牙殖民势力衰弱后,西班牙人乘虚而入。它先是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谋取中国领土和在华贸易权,遭拒绝后便采用武力于1624年占领我国领土台湾。如同葡萄牙人一样,其对华扩张充满了“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①的“基督教殖民制度”。

与欧洲的殖民扩张并起的是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天主教的海外扩张。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培育了欧洲社会的思想革新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十六世纪以德国马丁·路德为旗帜的宗教改革运动。革新者抨击罗马教廷的腐朽专制统治,在教务管理方面推崇民族自主、自治原则;在教念上则认为,要得到上帝拯救,只有依靠信仰,而不在于遵守教会的规条。总之,这次运动显现的是人文主义特征。运动从形式上表现为革新者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的对立,其实质则是西方市民和广大农民要求政治权利和改善社会地位的斗争。

这次运动导致了罗马教会的分裂,有瑞典、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及德国北部,英、法的西部和南部改信基督教新教,几乎是使半个欧洲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221页。

天主教势力因宗教改革被消弱,迫使罗马教廷采取对策,这即教史上所谓的“反宗教改革的运动”。反宗教改革运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教会内部进行整顿,以消除教会内部弊端、完善教会自身建设、维护教皇权威为宗旨;二是向海外进行教务扩张,挽回教会在地域上的损失。

第二节 耶稣会性质和使命

在推动天主教扩张发展战略方面,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耀拉(Loyola),西班牙人,原多明我会士。教史著作说他年轻时是“卑鄙狡诈,性情粗暴,报复成性”^①的人,后在战争中负伤,使腿致残。也许是他人生的这一倒霉际遇,使他人生出现“转向”,开始反省自己的罪恶,立志作一个圣徒。

欧洲的宗教改革使他认识到教会的危机,他决心创建一跨国的宗教组织来维护扩大天主教在世界的势力。1534年他纠集了6名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巴黎蒙特马利圣马教堂成立了大名鼎鼎的耶稣会。

耶稣会后来成为罗马教廷修会中最有影响的修会,其成功在于它以一套强有力的手段,将会士的信念、行为有效地整合于为罗马教廷的尽忠和基督的传布中。与其它修会相比,耶稣会形象、精神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其组织观念的专制性。它采取军事组织建制,强调“绝对服从”,诸如罗耀拉在其著作《神操书》中提出的,会员对教皇和上峰“要像柔软的蜡,听其搓揉;要像死尸没有自己的

^① (法)埃德蒙·帕里斯著,张茄萍等译:《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0年,第21页。

意志和知觉；……要像老人的拐杖，可以随人摆布，为他服务”^①。虽说这种强加于耶稣会士精神和心灵上的奴役性服从，未免极端和残酷，但相对于“有多少个多明我会士，就有多少种见解”的组织涣散而言，却使耶稣会保持了高度的纪律和统一。要知道，耶稣会是在罗马教廷因内部腐败和宗教改革冲突得几尽毁灭时成立的，在此情形下，耶稣会强调教宗至上就维护了天主教的团结，强调服从又可使基督徒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其积极意义，可如意大利基督教学者柯毅霖所说：利于在教会中于整体上形成可行的肯定性愿望，可使耶稣会士无条件地派往各地传教^②。历来的神学家对耶稣会士的这种精神多有美誉，如一叫鲁凯特的神父在其著作《圣·伊纳爵·罗耀拉》中对“绝对服从”这样吹捧：“（这）远不是人格的降低，而是智者的自愿，是自由之顶峰，是对我们自身奴役的一种解脱”。其实，这只不过是教会和世俗王权借神权对教民人身和精神的奴役。其政治上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教皇永无谬误”这样说教是十足的荒诞，而加于罗马教廷的这种神权专制，又是多么相悖于文艺复兴后世俗社会的民主意识。问题更是，教皇为维护教会和自身的利益，耶稣会“绝对服从”的会规便成了教廷用于打击宗教敌对派和世俗社会进步势力的工具，这就把耶稣会的某些活动推向政治，使耶稣会成为一切民主自由的宿敌和政治阴谋、罪恶的渊藪，以致使耶稣会有“世界宪兵”的称谓。

为防范个人野心和贪图安逸享受对成员心灵的侵蚀，耶稣会士被禁止在政治上接受职务，还要发誓做到三绝（绝财、绝色、绝世俗荣耀），这使其成员可杜绝世俗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拖累，一心献身于宗教事业。此外，会规对耶稣会士的礼仪举止也有严格要求。总之，罗耀拉把他个人性格上的坚毅、激情和狂热注入到其弟子的

① 江文汉著：《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6页。

② 柯毅霖著，王志成等译：《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思想及组织建设中。看起来,这有些残酷和绝对,但正是缘此保证了其弟子们行动的实效性,使耶稣会士成为当时欧洲最具战斗力和活力的组织。

耶稣会系因反宗教改革而成立的,这就使其本身与时代先进潮流、人民革命精神有若干的格格不入处。它又是教皇推行绝对权力主义、企图向世界各国扩展影响寻求霸权的得力工具,它就不能不介入政治角逐。由此,其历史活动在许多方面给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十六世纪法国开明的《百科全书》派指控耶稣会士是“各国君主的政治工具,参与政治阴谋和策划”^①。也有人指责耶稣会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说罗耀拉是“黑色教皇”^②。在近代,耶稣会协助教皇和各国反动统治者打击镇压革命势力,挑动战争,更是犯下了累累罪行。但在历史上,它于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们重视知识,扩广教育,如罗耀拉就认为“对古典文化和新知识的真诚热爱,是极其密合无间地与基督教原理为一体的”^③。耶稣会成立后在欧洲建立许多学校,还设立灵采研究院,吸引欧洲各地有才华的科学家到此工作。伽里略就是其一,到中国传教的邓若函(Jean Terenz)、罗雅各(Jacques rho)来华前也曾在那里工作过。二是重视国外传教。耶稣会的政治理想是让全世界都服从罗马教廷,这要求他们必须去世界各地并投身到征服人的心灵的活动中去。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 1534—1549)正是通过它激起向国外传教的热情,扩大天主教在世界的影响和地盘。虽说多明我、方济各等其它天主教差会也参与其事,但远不及耶稣会的影响大。

① 白晋著,冯作民译:《清康熙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士》,台湾光启出版社,1966年,第144页。

② (法)埃德蒙·帕里斯著,张茹萍等译:《耶稣会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0年,第3页。

③ 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神父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6页。